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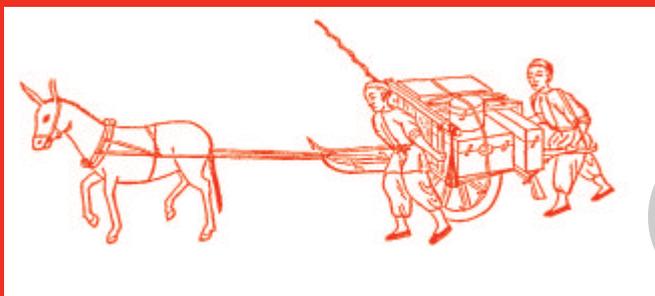
- 25 Victor Louzon, "From Japanese Soldiers to Chinese Rebels: Colonial Hegemony, War Experience, and Spontaneous Remobilization during the 1947 Taiwanese Rebellion,"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7, No.1 (Feb 2018), pp. 162-179.
- 26 樹仁大學林綺雯博士提供資料，特此鳴謝。
- 27 Brandon Palmer, pp. 6-11.
- 28 Brandon Palmer, p. 31.
- 29 Karl Hack and Tobias Rettig, p. 28.
- 30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 31 Sartaj Alam Abidi, Satinder Sharma, *Services Chiefs of India* (New Delhi: Northern Book Centre, 2007), p. 43.
- 32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1945*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xix.
- 33 Kevin Blackburn, "Colonial Forces as Postcolonial memories: the commemoration and memory of the Malay Regiment in moder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Karl Hack and Tobias Rettig, pp. 302-323.
- 34 Phillip Bruce, *Second to None: The Story of the Hong Kong Volunteer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12.
- 35 何家騏、朱耀光，《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香港：三聯書店，2011）。
- 36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 5-9。有關香港本土觀點問題，亦可見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青森文化，2014），頁 14-18。
- 37 John Carroll, *Edge of Empire: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11.
- 38 「華洋雜處」一詞來自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有關香港早期歷史的著作《華洋雜處》。見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9 Valerie Yow,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Guid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5), p. 3.
- 40 Valerie Yow, pp. 5-14.
- 41 英國華人職業傳承史計劃網頁：<http://www.britishchineseheritagecentre.org.uk/>。
- 42 David Killingray, *Fighting for Britain*, p. 4.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首支  
華人部隊：  
「廣州苦力團」



官兵一體照會，若汝等善待華兵，渠等即願效死命。<sup>1</sup>

——中國遠征軍司令部，1860年5月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苦力團成軍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已有不少沿海華人協助英軍作戰，例如提供食物、帶路等，甚至在英兵後面搶掠。<sup>2</sup> 例如，在英國皇家海軍三等戰列艦韋利斯利號（HMS Wellesley）上擔任船醫的祁禮（Edward Cree）在回憶錄中提到，當時船上已有華人水手。<sup>3</sup> 可是，當時英軍尚未組成正式的華人部隊。第一支華籍英兵部隊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出現。1856年，亞羅號（Arrow）事件發生，英國乘機動武，以修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迫使清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由於英軍在香港的兵力不足以獨力制服滿清，以至近在咫尺的廣東地方政府，英國必須自印度調來援軍，但該地在1857年爆發備兵叛變，使英國一時在亞洲頗缺人手應付。該年，陸軍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彭慕來勳爵（Lord Panmure）下令臨時

徵用 750 名苦力（咕喱）擔任後勤工作，由每 16 人負責搬運一門火砲。<sup>4</sup> 此決定頗受身在香港和廣州的英人所嘲笑，但苦力們在英軍完全陌生、而且缺乏道路的環境中極大地支援了英軍的後勤。<sup>5</sup> 在 1857 年 12 月參戰的苦力共 987 人，其中 804 人為華人，183 人為馬來人。<sup>6</sup> 英軍於 1857 年、1858 年兩次攻入廣州，然後於印度兵變後逐步增派援軍至香港，企圖擴大侵略範圍至長江三角洲與華北地區，並於 1860 年 3 月強佔九龍，與兩廣總督勞崇光簽訂協議租用九龍（戰後通過《北京條約》使之成為割讓地），使香港成為英國進攻華北的後勤基地。

佔領廣州後，英軍未有解散其隨隊苦力，而是擴大建制，把他們組織成英軍第一個正式的華人部隊「廣州苦力團」（Canton Coolie Corps）。英軍深入中國內地作戰，雖然指揮、裝備、訓練、組織和通訊較清軍優良，但人數卻處於劣勢，而且作戰範圍遼闊，補給線極長，單是食物一項已不能自給，因此必須依賴當地人協助後勤運輸。為滿足英軍對後勤人員的龐大需求，加上印度兵變後英人對大規模徵用印人頗有戒心，遂於香港、九龍及廣州一帶徵召更多苦力協助搬運大砲、行李和物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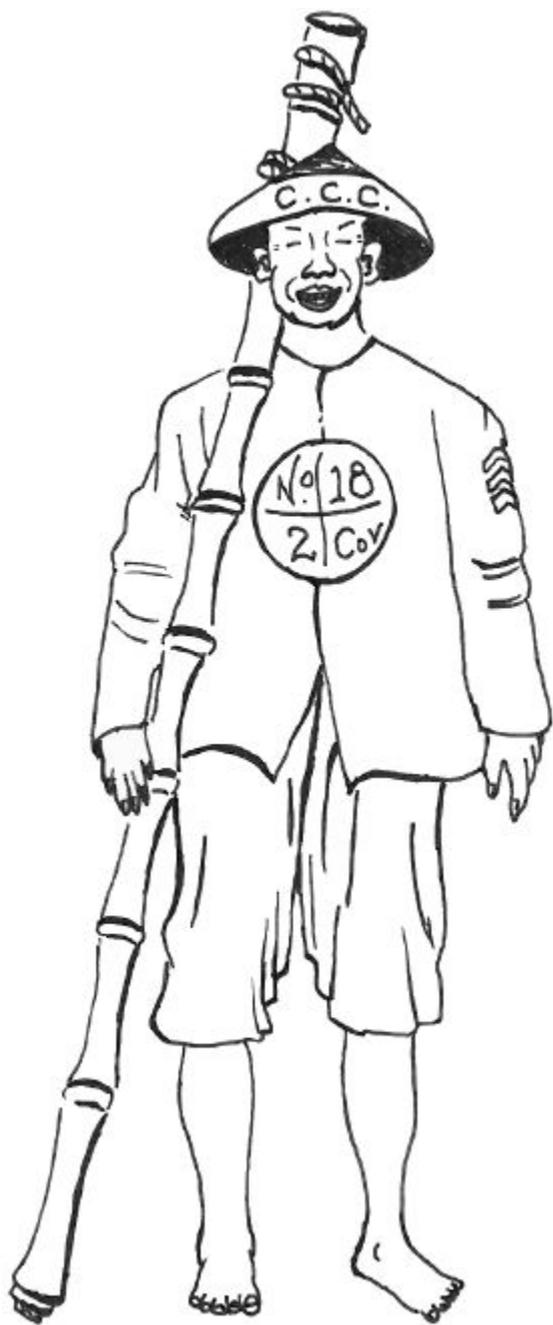
1860 年 2 月底，英軍遠征軍總司令克靈頓中將（Lt. Gen. Sir James Hope Grant）命令第 12 馬德拉斯土著步兵團（12th Madras Native Infantry）的譚寶少校（Maj. John Temple）組建苦力團，並發給他每月 7,732 鎊用以徵募華兵，另有 576 鎊為多名英籍兼任軍官的特別津貼。預想中的苦力團規模龐大，每個英軍的步兵團將有一連，每連 400 人，不計算本已招募的 700 人在內。<sup>7</sup> 每隊中懂英語者有機會成為士官，協助指揮和負責翻譯工作。苦力隊有數名中醫隨隊，另外由印軍英籍醫官檢查部隊的健康狀況。

英軍多徵用客家人為隨隊苦力。客家人是來自北方的移民，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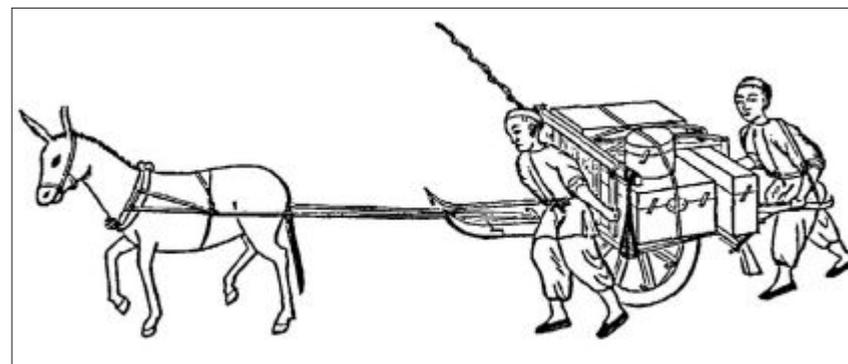
體格較南方本地人壯健，但土客人口常因為爭奪資源或家族恩怨而出現武裝衝突，客籍人口亦因此與官府關係不佳。<sup>8</sup> 當時威脅推翻滿清的太平軍，在建立初期亦主要由客家人組成。<sup>9</sup> 眼見英軍大量使用華兵，與英國一同入侵中國的法軍亦徵募自己的苦力隊，稱為「中國軍團」（Corps Chinois），人數約有 1,000 人，但部隊內的廣東人和佔多數的上海人關係不睦，而且待遇較差。<sup>10</sup>

苦力團成軍後，苦力兵全體獲得制服。他們全都穿上清朝常見的深藍色棉褂和馬褲（每人兩套，使用六個月），頭戴竹篾編織成的笠帽，上書苦力團的簡寫「C.C.C.」三個黑色大字母。胸口和背部與常見的清代兵勇一樣，縫上一個白色黑邊的大圈，由一黑線分成兩半，上面以英文和阿拉伯數字寫有苦力兵的隊號和士兵號碼（上方為兵號，下方為隊號），士兵左上臂則與英軍官兵一樣，有標示其軍階的徽章。與當時部份印度兵一樣，苦力兵們沒有獲發鞋子。他們大多沒有剪去其辮子，只把它們紮上笠帽，英軍亦未要求他們剪去。負責帶隊的英籍軍官則與其他英軍後勤人員穿着相同軍服，但他們的長褲兩邊均加上了一條白線，以示識別。據英軍紀錄，每個苦力兵最少可背負 50 磅（22.67 公斤）的物資，使用擔挑時則可背上更多。英軍亦記載苦力團經常使用一種單輪木頭車，可以盛載逾 400 磅（181 公斤）的貨物。<sup>11</sup>

苦力團組織初期最大的問題是逃兵。當時有謠言指英軍會把苦力隊當作「人盾」使用，由苦力在前面掩護，英軍於後面開火。英軍徵召苦力後安排他們排成四行列隊步操，更使謠言疑幻似真，越傳越廣。英軍為建立信用，向所有新兵預先發放數月薪金。初時，苦力兵每月工資是五個銀元，助理士官是七個銀元，士官則有十個銀元。可是，由於應募者不多，英軍在 1860 年 5 月增加苦力兵的薪金至苦力兵九個銀元（一鎊 17 先令六便士或 6.29 兩），助理士



華人苦力兵的制服，1860年（歐陽佩雯小姐畫；參考自英軍檔案資料〔見註11〕及 Ian Heath and Michael Perry,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6* [London: Osprey, 1994]）



苦力兵常用的木頭車（Salis Schwabe, p. 815）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官 11 個銀元，士官則有 14 個銀元（表 1）。<sup>12</sup> 當時，一名石工的工資為每日 2.4 錢（每月 7.2 兩）。與之相比，苦力兵的工資則略遜，只有 6.29 兩。<sup>13</sup> 可是，由於不知會否成為人盾，因此雖然待遇不算太差，仍有不少應徵者拿到薪水後即行逃逸。英軍本打算徵募 4,000 名華兵，但初期只能招募大約 2,000 人。<sup>14</sup> 據隨隊英印軍軍醫連尼（D. F. Rennie）回憶，苦力團初期均有英籍士兵陪同，以維持秩序和阻止逃兵。由於英軍士兵尚未能分辨中國人的樣貌，故苦力兵仍不時逃脫。關於逃兵，連尼寫道：<sup>15</sup>

數日前，有一個苦力想出一個絕妙的逃走辦法。他上船前獲得 27 元（三個月薪餉）後，他跟着看管他的一名英兵在岸上購買日用品。他買來胡椒粉，乘英兵不察時撒向他的雙眼，然後撕去身上的隊號逃去無蹤。在更多的時候，逃兵只需帶同英軍前去人多的地方，然後偷偷撕去隊號，再混入人群之中。英兵尋找他的戰友時，往往只能一頭霧水地發現地上的隊號，以及

附近全部看來長相和衣着都一模一樣的人群。自此以後不久，士兵們都死死拿着剛徵召的苦力的辮子，直到上船後才敢放手。

連尼曾提及一艘軍艦接收十名苦力兵後，翌日早上只剩下四人，其餘六人不但逃去，更再次應徵領取薪水。<sup>16</sup> 由於英國政府在1868年卡德威改革（Cardwell Reform）以前對陸軍士兵非常刻薄，因此亦有可能出現英籍士兵和苦力對分薪餉後讓後者離去的情況。

苦力團隨英軍北上華中和華北作戰前，英軍在香港島跑馬地附近為他們建築了臨時軍營。時值炎夏，營房以竹搭建而成。營中有兩排竹床，上面再放上竹篾，兩端有煮食用的火爐。連尼對一眾苦力兵於營房中生火煮食感到吃驚，認為眾人毫無防火觀念。連尼亦發現英軍對苦力兵少有約束，眾華兵亦自得其樂，每日工作完畢後即回營準備晚餐。<sup>17</sup> 當時，苦力兵的糧食配給包括每星期三日，每日半磅醃豬肉或牛肉（227克）、半磅豆（227克）、一磅半白米（681克）、四分之一安士（7克）檸檬汁和砂糖；另外四日每日兩磅（908克）白米和半磅（227克）鹹魚；蔬菜則每日配給。<sup>18</sup>

表 1：苦力團規模與官兵待遇（1860年2月）\*

1名司令	每月400盧比（額外津貼）
1名副司令	每月250盧比（額外津貼）
12名副官（subaltern officer）	每日9先令6便士（額外津貼）
11名士官（company sergeant）	每日1先令6便士（額外津貼）
280名傳令兵（英兵）	每日9便士（額外津貼）
4名中醫師	每月6鎊5先令
40名華人士官	每月2鎊18先令4便士
40名華人助理士官	每月2鎊5先令10便士
4,000名苦力兵	每月1鎊17先令6便士

\* Mark Bell, p. 422.

## 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苦力團

至1860年4月底，苦力團300人隨英軍2,500人登船前往舟山群島。連尼記下了他在其中一艘運兵船上的見聞，足可描述當時大致情況：<sup>19</sup>

（當時）有300名中國苦力在船上，同時有近120名第44團（44th Foot）的士兵……苦力們正在列隊步操……操法是要他們順着號碼列隊，然後點算人數，以確保前一晚沒有人跳海逃走……完成列隊後，眾人顯得興高采烈，連忙繼續準備出航的工作。我走進船艙察看他們的住處，見他們都睡在下層的蓆上。至少有三分之一人經常在露天甲板，另外有相當比例的英兵看管。他們每人都帶上一些箱子，內裏有各種可以在路上享受的副食品。他們的正餐由英軍提供，包括白米飯和豬肉……。

部份苦力兵有時亦受到不公的待遇。據連尼記載，他登上1,300噸的運兵船溫尼法號（HMS Winifred）時，發現船上有十多名正在發燒的華兵，詢問隨隊中醫後，才得知有近550名苦力兵與140名英軍分別居於船的兩端，但船上人數比編制多出三分之一。中醫說船上人數太多，溫度太高（too many piecee men, too muchee hot）。連尼又發現船上英軍不願任由華兵在露天甲板睡覺，怕他們趁機逃去，令華兵所居住的船艙過度擁擠。<sup>20</sup> 為免陣中英兵欺凌苦力兵，英軍司令部特別命令英兵善待華兵。<sup>21</sup> 司令部又為使用苦力兵訂下一套通例，包括每名苦力兵最多攜60磅行李，每團歐洲步兵可獲配屬一連苦力團兵。每個苦力連名義上有400人，但實際人數則根據

配屬部隊人數以及其任務而定。登陸後，苦力連負責運輸彈藥、營具、軍糧、柴薪、水，以及額外的被服到達戰場；他們亦要負責運送傷病員以及軍官的行李（以每名軍官配屬兩人為準），並緊跟所屬部隊，於其後方紮營。停止行軍時，他們則負責安排運送物資到所屬部隊的營地。

雖然英軍北上過程大致順利，但其中一艘蒸汽運兵船援助號（HMS Assistance，1850年造）在6月1日於維多利亞港出發數小時後，即於港島深水灣附近觸礁沉沒。當時船上有850名苦力兵及大量物資和火炮，足可釀成重大災難。輪船觸礁時，數百名苦力兵躡上甲板準備跳船，但被船上英軍阻止，以防他們將船隻弄翻，雙方衝突一觸即發。所幸，當時船上有一百多名曾於廣州協助英軍的苦力團老兵，他們向眾人保證維持秩序將可使他們獲救，加上船隻沉沒時離岸只有50多米，因此意外中幾乎無人死亡，850名苦力兵上岸後只有七人未能尋回（逃走或溺死）。<sup>22</sup> 由此事可見，雖然苦力兵只接受了初步的軍事訓練，但與英軍長期合作的經驗（包括人身安全和穩定的收入）使部份苦力兵對英軍頗為信任，事件亦使英軍留意到部份較有經驗，或懂得英語的苦力兵足以勝任領導的工作。

1860年7月，英法聯軍在大連灣附近登陸時，約有3,000名苦力兵隨隊作戰。登陸的七個歐籍步兵營（時稱為團）均有自己的苦力連。苦力因為他們「高昂的士氣和合作的態度」而贏得英法雙方的尊敬。他們為登陸部隊運送糧食和軍火、挖掘水井、使「參戰部隊在整體上更為健康」。<sup>23</sup> 由於苦力兵的表現，英軍亦曾增加其伙食配給，以示獎勵。正如連尼提到苦力兵有時亦被刻薄對待，尤其是隨同海軍作戰者。<sup>24</sup> 可是，身在華北的苦力兵不能像以往那樣一走了之，脫離部隊回到鄉下。來自廣東的苦力兵逃走後，只會發現自己身處存有敵意而且語言不通的人口之中。苦力團曾發生一次大規

模的脫隊事件，足可說明這個問題。當時，有近90人離開部隊，但他們遇到當地居民後全被捕獲，其中大部份人被殺，少數被送往地方衙門，只有六人生還回到部隊。<sup>25</sup> 因此，身在華北的苦力兵多樂見英法聯軍獲勝，因此事關乎他們的安危。<sup>26</sup> 另一方面，苦力兵亦曾參與搶掠，解釋了為何他們被當地居民仇視。在進攻天津和北京附近的通州期間，英軍曾嘗試在華北招募更多苦力兵，但來自北方的苦力兵由於缺乏訓練，經常脫隊搶掠，最終英軍把一名案情嚴重的苦力兵問吊，情況才得以受控。<sup>27</sup>

至8月，英法聯軍登陸北塘時，苦力隊不但為先頭部隊解決水荒，更全程在積滿淤泥的海灘來回運送貨物，使前線士兵得以集中精力作戰。曾參與此役，其後官至陸軍總司令的伍斯利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認為，一名苦力可取代「三隻運輸動物」（pack animals，指騾或牛）。<sup>28</sup> 聯軍從北塘進攻大沽時，大量騾馬死在充滿泥濘的路上，苦力兵則協助聯軍把大砲和彈藥推往前線。英軍的後勤人員記述：「苦力兵和騾馬不分晝夜地工作……不少騾馬過勞而死……一星期後，不足半數騾馬可再走一里，四分之三的騾馬背部出現紅腫。」<sup>29</sup> 可見，若無苦力兵協助，則聯軍或需要更長時間進攻大沽砲台。英軍後勤軍官直言：「我們（英軍）並非每次作戰都可依賴苦力團。」<sup>30</sup> 進攻大沽要塞期間，英軍的苦力團留在火線後面負責運送物資和傷員，法軍的苦力兵則負責站在浸了水的壕溝中舉起木梯，使法軍士兵可以攻上砲台。<sup>31</sup> 雖然英軍的苦力兵未有參與戰鬥，但他們亦面對被俘的危險。一次，十多名苦力兵在英軍後方工作時被清軍騎兵擄獲。可是清軍未有殺害他們，而是把他們的辮子剪去，再將他們送回英軍處。這個舉動，可算是剝奪了他們「清人」的身份，使之難以重回家鄉，無異於把他們處決。<sup>32</sup>

英法聯軍在1860年10月攻陷北京，救出被囚的英國外交使節

巴夏禮（Harry Parkes）及其隨員並搶掠和燒毀圓明園等「三山五園」後，清政府與兩國簽訂《北京條約》，斷斷續續逾四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終告結束，存在了近四年的苦力團亦被遣回香港解散。戰役即將結束時，連尼注意到部份華兵已養成一定的軍事紀律：「在碼頭上等候駁船回去威悉號輪船（SS Weser）時，約 300 名華兵列隊行進，以擔挑搬運行李。不少華兵已養成軍人氣質，把擔挑像步槍一樣扛在肩上，步履整然，看來就像可以訓練成好士兵的材料。」<sup>33</sup>

## 小結

在 1840 至 1860 年代，英國的海陸軍雖然有能力在中國作戰，並在戰場上屢次擊敗滿清軍隊，但他們亦要面對複雜多變的後勤問題以及疾病的威脅，因此必須要依靠與華人的合作。英人利用客家人口對滿清的不滿，與部份加入英軍的華人建立了互信，使他們願意協助英軍作戰。在華洋相處的過程中，英人對華人的軍事潛能有進一步的瞭解。雖然英人對清政府不無蔑視，但細看英國軍人對華兵的描述，可見他們對華兵的耐力和潛質不無欣賞之意。這個態度促使他們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即開始考慮應否徵用華兵的問題。

## 註釋

- 1 Salis Schwabe, "Carrier Corps and Coolies on Active Service in China, India, and Africa, 1860-1879," in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ion Journal*, Vol. 24, No. 108 (1881), p. 834.
- 2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頁 15-19、36。
- 3 Edward Cree, *Naval Surgeon: the Voyages of Dr. Edward H. Cree, Royal Navy, 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 (New York: E.P. Dutton, 1982).

- 4 Mark Bell, *China: Being a Military Report on the Northeastern Portions of the Provinces of Chih-Li and Shan-tung; Nanking and its Approaches; Canton and Its Approache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the Chinese Civil, Naval,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s and A Narrative of the War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Calcutta: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884), p. 313; *Dragon Journal: Commemorative Issue* (Hong Kong: HKMSC, 1997), p. 6.
- 5 Demetrius Charles Bougler, *China* (New York: Peter Fenelon Collier & Son, 1900), p. 355.
- 6 Mark Bell, p. 314.
- 7 Salis Schwabe, p. 815.
- 8 David Field Renni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 and Japan: Peking 1860; Kagoshima 1862* (London: John Murray, 1864), p. 15.
- 9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頁 10-11。
- 10 David Field Rennie, p. 46; Salis Schwabe, p. 816.
- 11 Salis Schwabe, p. 815; Mark Bell, pp. 422-423.
- 12 Mark Bell, pp. 422-423.
- 13 蕭國健，《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香港教育圖書，1994），頁 63。本書參照林滿紅一銀兩等於 1.43 銀元的換算率。林滿紅，《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 3。
- 14 Salis Schwabe, p. 816.
- 15 David Field Rennie, pp. 25-26.
- 16 David Field Rennie, p. 16.
- 17 David Field Rennie, p. 17.
- 18 Mark Bell, p. 425.
- 19 David Field Rennie, p. 16.
- 20 David Field Rennie, pp. 24-25.
- 21 Salis Schwabe, p. 834.
- 22 David Field Rennie, p. 21.
- 23 Salis Schwabe, p. 817.
- 24 David Field Rennie, p. 55.
- 25 David Field Rennie, p. 54; Salis Schwabe, pp. 816-817.
- 26 Salis Schwabe, p. 817.
- 27 Salis Schwabe, p. 818.